

略论 20 世纪法国汉学界中国通史撰写的范式

□ 孙 越

摘 要: 20 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考狄的《中国通史》、马伯乐和白乐日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融合”的演变历程。其中《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的撰写具有转折意义:马伯乐对经济史料的重视和在古代宗教、语言、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基础,以及白乐日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范式”的引入,既完全颠覆了考狄《中国通史》的“王朝史范式”,又为谢和耐兼具“王朝史”和“总体史”特点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 法国汉学; 中国通史; 王朝史范式; 总体史范式

中图分类号: K207.8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4.008

一、引 言

中国史学界一直有通史情怀,从《史记》《资治通鉴》到近现代《中国通史》(吕思勉)、《国史大纲》(钱穆)、《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史纲要》(翦伯赞),等等。而大陆另一端的法国汉学界也对编纂中国通史怀有浓厚兴趣,自 18 世纪始至今方兴未艾。本文将通过法国汉学界中国通史编纂历程的梳理,尤其对 20 世纪三部重要的通史性著作的比较,揭示出其撰写范式的变化,并从中管窥法国汉学史的流变。

二、法国汉学界编纂中国通史的历程

法国汉学历史悠久,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大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尤其是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国王数学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进入宫廷,成为康熙帝的私人教师。1698 年在白晋的主持下,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等一批法国传教士登陆中国。冯氏因精通测绘受到康熙帝赏识,命居京城,

后自习满文,并奉康熙帝之命将《资治通鉴纲目》译成满文^①,后又译成法文。在此基础上,冯氏结合中西各代史料,编纂了一部 12 卷本的《中国通史》,但当时未正式出版。1773 年,耶稣会解散后,由格鲁贤(Abbé Jean-Baptiste Grosier, 1743—1823)在巴黎将此书分 12 卷付梓。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被誉为在其之后在欧洲刊出的“中国通史”系列之“楷模”,“西方唯一最全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中国通史”^②。

1814 年底至 1815 年初,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首开汉语讲座,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在法国确立。但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18 世纪 40 年代之前,法中两国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故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描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19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列强入侵和外交、传教的恢复,法国汉学家倾向于对中国断代史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进行考察,但整个 19 世纪的法国汉学界没有通史性著作出版。

20 世纪的法国汉学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是法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汉学家,是著名汉

① 参见陈喆:《从年代学到通史:17—18 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史撰述》,载《世界历史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83—106 页。

②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50 页。

学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的导师, 也是汉学期刊《通报》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考狄编纂的《中国通史》, 全称《中国和外国关系通史 (远古至满洲王朝灭亡)》, 于 1920 年出版, 共四卷本, 共两千多页, 自中国上古时代起至 20 世纪初止。格鲁塞 (René Grousset, 1885—1952) 于 1942 年出版《中国史: 从起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该书的确算一部通史, 但由于作者长期以来以研究内亚的游牧民族为主要方向, 撰有巨著《草原帝国》, 故其《中国史》侧重于从华夏世界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以及各种宗教势力的关系出发来阐述中华文明的特点——将一切外来势力吸收并中国化。1967 年,《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一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包含 20 世纪上半叶两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 (Henri Maspero, 1883—1945) 的遗著和白乐日 (Étienne Balazs, 1905—1963) 的续写, 经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汇编和注释而成。马伯乐是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界明星式的汉学家, 专注于对中国古代 (尤其是上古) 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他本想编纂一部完整的通史, 但因二战爆发后被关入集中营, 不幸于 1945 年去世。以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见长的法籍匈牙利裔汉学家白乐日继续马伯乐未竟的事业, 整理并续写书稿, 据信书稿于 1953 年停笔^①, 即写到北宋末年为止。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的《中国社会史》首次出版, 同年获圣杜尔奖。谢和耐早年师从戴密微, 是 20 世纪晚期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谢氏的《中国社会史》也相当宏大, 涵盖了从中国上古到改革开放之间的历史, 且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做了数次修订。该书也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关注, 中文版由耿昇先生译出, 1995 年出版。

进入 21 世纪之后, 法国依然有新的“中国通史”出版, 包括埃里希芙 (Danielle Elisseeff) 的《中国史: 当下的根源》、瓦尔特 (Xavier Walter)

的《中国小史》、贝尔纳-格鲁托 (Anne Bernard-Grouteau) 的《中国史》等。这些通史性著作大多篇幅精短, 语言简明, 属于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 但从读者的在线评论来看毁誉参半, 在法中两国学术界都未引起太多关注。

下文着重对 20 世纪早、中、晚期完成的三部重要的通史著作——考狄的《中国和外国关系通史》 (以下简称“考狄通史”)、马伯乐和白乐日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 (以下简称“马白通史”)、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 (以下简称“谢氏通史”) 进行分析, 揭示其在史学范式上的区别与转变。

三、考狄通史的王朝史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1922—1996) 首次提出“范式”概念, 原指“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 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②, 范式的改变会使科学家改变其研究所及世界的看法。^③就通史编撰而言, “范式”应被理解为通史编撰的范例性框架, 及此框架统御下的核心史观、史论、史料等, 其又将为相关史学领域后续的编撰和研究提供模型。

1901 年 9 月, 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 指出新旧史学的差别: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 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 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 虽名为史实, 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 即国民全体之经历, 及其相互之关系。”^④其中“前者史家”实指中国传统学者编纂的王朝史。据此, 可总结出“王朝史范式”史学著作的基本特征: 以王朝 (或帝王统治) 的兴亡更替作为编纂和分期的基本框架; 以与权力相关的历史事件作为核心史料; 以王朝的兴衰成败作为史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中国史而论, 则展现出“以帝王将相为重点”“以征伐、入侵、起义、政变为关键”“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等特点。

① Henri Maspero et Étienne Balazs,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Paris: PUF, 1967, p. VI.

② 托马斯·库恩著, 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9 页。

③ 同上, 第 101 页。

④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 载《史林》2003 年第 6 期, 第 2 页。

考狄通史符合王朝史范式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中国史的分期^①问题上，考狄的某些观点与中国乃至东亚主流学界的看法相同或近似，如强调“唐宋变革”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化的开始；也有不太符合的，如将宋元和明清分开，而传统学者则看重从宋到明在思想文化上的连续性。但无论如何，考狄通史依然以王朝的更替作为编撰和分期的基本线索，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观念和实践相吻合。在第一卷的目录中，除了前两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国居民的起源问题以外，第三章的题目分别为“五帝”“尧和舜”“夏和商”“第三王朝——周”……“第四王朝——秦”“第五王朝——汉”……^②给中国学者的感觉是将《史记》中诸《本纪》和东汉以降的各朝断代史加以汇编。其次，考狄对古代帝王花了较大笔墨进行评述，甚至直接“模仿”中国古代文献，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如在叙述秦代历史时，他直接概述了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的有关内容：从颛顼之孙女女修吞了鸟卵生下秦人的祖先大业起，谈到秦非子、秦侯、秦公伯，再到襄公、穆公、孝公，一直到秦始皇^③。考狄对秦始皇的评述却没有多少史料支撑，更缺乏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分析，定论较为主观：

他造就了一个民族。他是中华帝国的真正奠基人，他的先辈们不过是各个部族的首领，部族的数量或多或少而已；他才是真正的皇帝。他身上兼有路易十一和黎世留的特

点；他打破了封建制度和领主们的权力。^④

接下来便是对秦始皇生平和功绩的介绍，包括嬴政是否为赵姬和吕不韦私生子之类的问题。^⑤可见，考狄对帝王及其谱系的重视，超过一般西方汉学家，此与中国传统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最后，考狄当时没有直接接触中文材料，而是采用冯秉正的法译本《中国通史》。^⑥如前文所述，冯氏是康熙时宫廷中通晓汉语诗文和历史的法国传教士之一，以中国史书为蓝本编译成《中国通史》。而考狄对冯氏通史材料的采纳，在客观上使其所编的《中国通史》至少在史料和史论上接近中国传统史书，基本上继承了王朝史范式。

四、马白通史的总体史范式

1929年，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和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创办《经济与社会年鉴》，倡导“总体历史”，以摆脱传统史学范式所推崇的“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和“编年偶像”，^⑦并认为，这种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而要进行总体史研究，就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⑧费弗尔还认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但人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人；也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有组织的人群。^⑨鉴于此，中国史学界一般将总体史（或“社会史”）视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非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⑩综

① 从考狄通史四卷本各自的上下限不难了解作者在对中国史具体分期上的看法：第一卷从远古到 907 年唐灭亡，大体为中国上古、中古史；第二卷从五代到 1368 年元覆灭，大体为从中古到近代的过渡期（所谓“近世”）；第三卷从明建立到清嘉庆年代结束，为近代前期；第四卷从道光即位到 20 世纪初清灭亡、民国成立，为近代后期。

②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1920, pp. 573–574.

③ *Ibid.*, pp. 196–197.

④ *Ibid.*, p. 198.

⑤ *Ibid.*, pp. 199–200.

⑥ Paul Pelliot, “Henri Cordier (1849–1925),” *T'oung Pao* 24.1(1925): 11.

⑦ François Simiand, “Méthode Historique et Science Sociale,”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03): pp. 129–157,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simiand_francois/methode/methode_12/methode_hist_sc_soc2.pdf: 25–26, accessed March 31, 2023.

⑧ 保罗·利科著，王健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⑨ 同上，第18页。

⑩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20页。

上，可归纳出“总体史范式”的基本特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史学研究，而非仅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学科或领域；研究对象是处在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人，而非“正统性”“合法性”“民族性”等抽象观念，也非对抽象事件的编年；研究对象是社会的、有组织的人群，而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好汉等孤立个体。

与考狄通史相比，马伯乐和白乐日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走上了总体史范式的道路。首先，马伯乐在编写该书时刻意回避大量的史实，而这些史实却是中国传统史书或采用“王朝史范式”的考狄通史所看重的。如在第二部分“秦汉帝国时代”，马氏只字未提秦国的起源和帝系，也未提及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之争、王莽篡汉等一系列战争和政变，对秦灭六国和嬴政称帝着墨也不多。从目录中的大小标题来看，除了前三节分别从国情、阶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介绍时代背景外，马氏着重从帝王、官制、选官制、兵制和财政五个方面梳理秦汉帝国的政治体制，^①凸显体制的延续性，刻意回避王朝史视角下的政治动荡与断裂。其次，从马伯乐的学术志趣和研究历程上看，这部通史受到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影响，以公元前三世纪为下限。此后马氏的许多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该书为中心撰写，或加以补充。对比《古代中国》和马白通史（第一部分）的结构，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联。马白通史的第一部分仅两章，第一章题为“领主社会”，第二章题为“从领主制度到诸侯并立再到帝国统一”，^②而《古代中国》共五卷，各卷大标题依次为“起源”“社会和宗教生活”“霸业”“战国”“古代文学和哲学”。^③马白

通史中第一部分各章内容基本与《古代中国》第一到第五卷的相关部分相吻合。^④可见，《古代中国》这种淡化政治事件和王朝更替，侧重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史论的范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伯乐对马白通史前两部分的谋篇布局。作者虽沿用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但已突破了王朝史范式的藩篱。再次，该部通史的续写者白乐日在学术背景上则更倾向于年鉴派所推崇的总体史范式。白氏早年受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影响，认为经济史是基本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他批评那种相互隔绝的汉学分支和“穷经皓首地追求细枝末节”的传统汉学家们，强调“大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⑤白乐日1932年有关唐代经济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已包含了指导其未来著作的主要思想。1949年，白氏加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⑥1955年，加盟年鉴派大本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六系并指导中国史研究，在年鉴派领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支持下发起“宋史研究计划”。^⑦尽管据戴密微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序言里的推断，白氏撰写该书后半部分的时间大约在1949年到1953年之间，^⑧但1955年白氏进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六系指导研究的事实则从侧面说明了白氏对年鉴派的认同，也体现出布罗代尔等年鉴派领军人物对白氏先前研究成果和方法的认可。最后，白氏对传统汉学的看法与年鉴派的理念相符。年鉴派以“总体史”为目标，形成开放的史料观，把史料范围扩展到几乎无限的境地，凡前人所写、所说、所接触、所制造的遗

① Maspero et Balazs, *op. cit.*, pp. 319–320.

② *Ibid.*, p. 319.

③ Henri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Paris :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27,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maspero_henri/C01_la_chine_antique/la_chine_antique.pdf, p. 3, accessed March 31, 2023.

④ 马白通史第一章的第三、四、九节（分别谈“文化的模式”“乡村生活”“宗教”）基本对应《古代中国》的第二卷的内容，马白通史第一章中的其他各节内容（“国度”“居民”“领主”“领地及组织形式”“商代诸王的生活”“王国和诸侯的行政体制”）基本涵盖《古代中国》的第一卷，马白通史第二章中的第一至第五节（“领主社会的毁灭”“乡村环境的演变”“诸侯权力的衰弱”“新的制度”“文官阶层”）基本涵盖《古代中国》的第三和第四卷，而后三节（“宗教生活”“政治思想和哲学”“上古末期的思想和文学”）基本对应《古代中国》的第五卷。

⑤ Paul Demiéville, “Étienne Balazs (1905–1963),” *T'oung Pao* 51. 2/3 (1964): 249.

⑥ Paul Demiéville, *op. cit.*, p. 251.

⑦ *Ibid.*, p. 252.

⑧ Maspero et Balazs, *op. cit.*, p. VI.

留物都可用来再现历史，而中国传统史籍里的文字史料很难导向年鉴派史学的目标。“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与这一史学领域的拓展密切联系的，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及对相应所需新方法的开发。”^①白氏认为中国官修史学是官吏们为自己写的历史，必须从其目的和影响里解放出来，“他想再现史书背后的人们，他想让他们变得有血有肉，也想了解他们的感受”^②。年鉴派史学家反对支持统治者的人撰写的事件史，这与白乐日对传统汉学的批评不谋而合。

综上，在马白通史的前半部分，马氏刻意回避某些史实，避免采用王朝史范式，而在架构上仿照其代表作《古代中国》，采用总体史范式，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古代思想、语言、文化、宗教等多领域的研究兴趣；而白氏则受其社会—经济史研究背景以及其所处学术氛围的影响，赞同年鉴派的某些观点，于是采用总体史范式来续写后半部分。可见，与考狄通史所遵循的王朝史范式相反，马白通史一以贯之地采用总体史范式，无疑是 20 世纪法国汉学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以下这段文字，出自马白通史第二部分第一节“富裕阶层的日常生活”^③，描写富裕女性的穿着打扮，清晰地体现了总体史以人为本、包罗万象而又细致入微的特点：

女性常穿的上衣和裙裳颜色不同，但色调更加鲜艳，如深绿色镶边的浅绿色上衣搭配布满红点的黄色裙子，或带有金色火焰图案的黑色上衣搭配红色裙子。当时的风尚不允许女性不施粉黛、不戴假发示人。她们不仅要在脸上涂脂抹粉，还要顾及背部和双肩，有的用米粉，有的用“胡粉”，即铅白；在此底妆的基础上，她们会上一些腮红（来自红

花 [carthame] 或辰砂），经面颊扫过唇边；随后在脸蛋上贴几颗假痣，最后在眼睛上方轻轻擦粉；到了汉代之后才开始用靛蓝涂眼影的风尚。眉毛被刮掉，钴蓝色的眉线取而代之，弯曲程度和位置依风尚而变——公元前二世纪，流行的做法是将眉毛画成反弓形；公元二世纪中期，风尚变成了弓形断眉；稍晚，又变成了宽厚浓重的眉形。当时的女人佩戴假发；近公元 50 年时，假发的髻子稍稍偏向一侧。

五、谢氏通史对两种范式的融合

谢氏通史的中译名为《社会史》，而按法文直译则应理解为《中华世界》或《中国人的世界》，可见作者视野的开阔。在中译本序言里，谢和耐开宗明义：

本书的目的无疑在于供大学生们作教科书之用，但也是和主要是为了使法国人理解中国文明在所有领域中都博大精深、瑰丽多彩。……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它始终对外开放，同时也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印度、伊朗、伊斯兰世界、地中海国家、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国家；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归根结蒂，人类在整个发展中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④

谢氏通史的目录亦相当宏大，全书共分五部分^⑤。从宏观架构看，依旧以王朝沿革为基本框

① 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② Daniel Holzman, “Henri Maspero et Étienne Balazs,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Études, tome LXXIII),”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3. 5 (1968): 1126.

③ Maspero et Balazs, *op. cit.*, p. 54. 中文由笔者译出。

④ 雅克·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译本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⑤ “上古时代”即“第一编 从古代王权到中央集权国家”，“军人帝国时代”含“第二编 中央集权国家的兴盛衰败”“第三编 中国的中世纪”“第四编 从中世纪到近代”，“自宋至明的官僚帝国”含“第五编 中国的‘文艺复兴’”“第六编 从汉化诸帝国到蒙古人入住中原”“第七编 专政君主和太监的统治”，“近代中国”含“第八编 专制的宗法制度”“第九编 从衰退到外辱”，“当代中国”含“第十编 灾难深重的中国”和“第十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篇章”。《中国社会史·目录》，第1—12页。

架，与考狄通史无异，只是在历史阶段划分上有不同观点。但细看具体章节的安排，谢氏通史中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在论述某一朝代时，通常在前半部分阐述重要政治事件或基本政治架构，而在后半部分则论述此阶段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领域的进展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如第三编“中国的中世纪”中，第一章阐述中国从军事专制到无政府状态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之下长江流域的世族统治和北方的汉化胡族统治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全面介绍中世纪文明，分玄学、美学、诗学以及佛教两个方面。^①又如第七编“专政君主和太监的统治”中，第一章阐述明王朝的建立和继续扩展，第二章介绍明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外患，第三章谈城市的发展和明末财政危机，第四章从哲学、科学、宗教角度介绍明代文化生活。^②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谢氏有意为之，因为作为教科书式的中国通史必须兼顾政治和“社会全局”。

在正文中，谢氏通史也体现了王朝史范式和总体史范式的交融。如第五编中对于宋代军队的论述，先概述宋代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其军事理念：

如果说宋王朝非常关注其防务，……那末相反，它却从未停止维持和巩固民权较之于军权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此外，鼓舞该王朝的思想恰与其北方对手的思想相反，前者完全缺乏能够引起赞扬的粗犷的暴力、如饥似渴地进行征服和统治的勇士特征，而这一切恰恰是其令人生畏的女真和蒙古对手们的天性。^③

接着梳理秦代以来的兵役制度，分析宋代施行雇佣兵制度的原因和优劣：

自从秦代以来，中国军队的势力就是在募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是募兵制提供了主要的兵员，非常幸运的是还可以由胡人部队来补充，比如以其耐力和战斗力而受到高度好评的游牧民和山地人的军队。但宋王朝却缺乏由胡人辅助部队组成的这种宝贵补充，而且还深受雇佣军的所有弊病之苦，如

开销骤增、在无战事的漫长时期内军纪涣散，以及军队如同一支与帝国无关的队伍一样行事的倾向。^④

随后笔锋一转，将宋代的兵制变革归因于军事技术的变革：

然而，11—13世纪是中国社会中军事技术取得明显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些进步可能改变了战争的特点，在长时期内对世界历史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们似应与作为这个时代之特征的研究、创造和实验精神有关。……未来的兵丁都是经过一系列考核之后才选拔出来的，考核涉及他们的体质、能力（跑、跳、视力、善射程度……）。根据其身材和身高进行分类，而最魁梧者被分配到精锐部队中，尽管并不适用于此种分类的特殊部队不断增加，如使用火器的士兵、坑道兵、使用投射器的士兵等。……

……发明创造受到了金钱奖励；新兵器在由军械库成批订购之前要做试验。1044年出版了曾公亮的一部有关军事艺术的著作《武经总要》，其中在新发明中特别提到了一种石脑油投火枪，其机理是由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活塞组成，因而可以连续喷火。^⑤

最后将军事技术变革置于“火器在欧亚世界的使用”这个大的技术背景中去，使宋代的制度史融入世界技术史：

……中国人将发火的引信与竹管配制在一起，从而最早发现了火箭原理。带铁或铜等金属管的最早的炮出现于1280年左右的宋元战争中，为了指称这种兵器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銃”。

因此，13世纪末传到欧洲来的已不仅仅是火药的配方了，而是在东亚做过长期摸索探讨和多次试验的创见与成果……这种传播似乎是通过伊斯兰地区的媒介作用而完成的……人们在传统上都认为蒙古人于1241年在匈牙利的绍约战斗中使用了火器。人们也

① 雅克·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目录》，第3—4页。

② 同上，第7—8页。

③ 雅克·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266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267—268页。

知道火器于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发展可能对于欧洲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它促进了中世纪武士贵族的崩溃。相反，这些新武器的发明却对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未产生任何影响，它仅仅是在国家军队的范畴内加入了同时得到改进的各种武器的整体之中。……^①

以上一系列“军事—兵制—武器—技术”的研究处在军事史或战争史的框架内，但融合了制度、器物和人三个要素，并让中国史与世界史相衔接，体现出王朝史范式和总体史范式的有机结合。无论从宏观架构还是从微观行文来看，谢氏的《中国社会史》都试图在一个传统的王朝沿革框架内顾及王朝史所偏爱的政治、军事、制度和总体史所偏爱的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之间的平衡，并尽可能将前者融入后者所展现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中，这恐怕也是一部面向学生和普通读者的中国通史所采取的最佳角度。从学术背景看，谢氏的汉学亦受到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的影响。^② 谢氏虽师承戴密微，而在治学上却更接近“师祖”沙畹的另一位弟子葛兰言。^③ 葛氏除师承沙畹以外，亦跟随法国社会学鼻祖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学习社会学，将社会学引入汉学研究，“突破了前辈和同时代汉学家的局限，具有了一种综合性的不局限于文本的视野”^④。此外，谢和耐的父亲路易 (Louis Gernet, 1882—1962) 是语文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古希腊研究专家，也是涂尔干的学生，还是葛兰言的好友，^⑤ 于 1948 年应邀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六系开设研讨课程。7 年后的 1955 年，谢和耐也进入六系任“研究指导”。因此，受到具有社会学背景的父亲路易和葛兰言的双重影响，又身处六系这个年鉴派的大本营，谢氏的研究兴趣变得非常广泛，包括寺院经济、敦煌学、南宋社会史、中国和基督教关系、古代中国的器物 and 科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撰写《中

国社会史》之时，谢氏本人已经完成了向“总体史学家”的转变。但考虑到学生和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史脉络的客观需要，谢氏还是以王朝更迭为基本框架，并用了不少笔墨——这一点上与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式通史有些相似。

六、结 语

法国汉学发展到 20 世纪渐趋成熟，汉学研究已从 17—19 世纪旅行者、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业余活动转变为汉学家的专业研究。一部分汉学家的目光从个别专业领域的探究转向对中国整体文明历史的梳理。由于未接触第一手中文材料，考狄《中国通史》的编纂只能以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为基础，将有关中文史料汇编成册，因此未摆脱中国传统的王朝史的局限。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与制度》里，马伯乐继承了传统汉学方法注重考据的特点，也发挥自身在上古宗教、语言、思想等领域的研究特长，从秦统一开始，转向对经济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从各个角度审视古代史；白乐日受到年鉴派影响，视角更多样，经济史、社会史的功力更扎实，对六朝、唐宋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分析得更透彻。谢和耐亦受年鉴派影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编撰《中国社会史》，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内，而非强调中国在地理上的封闭和在历史文化上的自足；但考虑到目标读者，依旧以王朝沿革为主线，尝试把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放到由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构成的宏大“社会背景”中去；即便无法融合，也尽可能做到二者的平衡兼顾，以满足学生和非专业读者的需求。总之，20 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兼容”的发展历程，这一趋势性脉络值得我国汉学研究界和史学界思考、借鉴。

(孙越：南京财经大学法语系)

① 雅克·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 269 页。

② 王铭铭：《葛兰言 (Marcel Granet) 何故少有追随者？》，载《民族学刊》2010 年第 1 期，第 7 页。

③ 徐琳玲：《一代宗师谢和耐“传统中国”的海外知己》，载《南方人物周刊》2018 年 3 月 15 日，<https://nfpeople.infzm.com/article/8022>，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31 日。

④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第 193 页。

⑤ Anne Cheng, “Hommage à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La Lettre*44 (2017–2018),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ettre-cdf/4627>, accessed March 31, 2023.

and Western countries' acquisi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Key words: *Ta Tsing Leu Lee*, Staunton, motiva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method of transl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ino-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 A First Exploration of the “Oriental Novel” in 18th-Century Europe

Jin Wen

Abstract: The “Oriental novel” was a phenomenon in European culture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to the 18th century. Many European philosophers and writers produced novels with Oriental settings, drawing on elements of Oriental narrative traditions, which largely shaped the European readers' imagination of East-West cultural relations.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disappeared after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early Orientalism and early Sinology—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hanges within Europe. Investigating the “Oriental novel”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picture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18th century.

Key words: Oriental novel, 18th century, the Enlightenment, Euro-Asian literary relations

On the Paradigms of the General Histories of China Written by French Sinologists in the 20th Century

Sun Yue

Abstract: The three general histories of China written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20th century—*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by Henri Cordier,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by Henri Maspero and Étienne Balazs, and *Le Monde chinois* by Jacques Gernet—had undergone paradigmatic evolu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Dynasty Paradigm, Total Paradigm and an integration of both.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marks a transition in the paradigmatic evolution. Maspero paid attention to the materials of economic history with a solid researching foundation on the religions, languages and ideology of the ancient China, and Balazs introduced the Total Paradigm from the Annales School, which completely subverted the Dynasty Paradigm inherited in Cordier'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and blazed the way for Gernet's masterpiece *Le Monde chinois*, which balanced the Dynasty Paradigm and the Total Paradigm.

Key words: French sinology, general histories of China, the Dynasty Paradigm, the Total Paradigm

Hot Topics and Turns: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Shanghai History in English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Last Decade

Zhu Ta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glish academic circles have produced many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Shanghai history, which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eight hot topics: class politics and Sino-foreign relations,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ethnic studies, modern governance and urban landscape, daily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cultural and artistic changes, folk beliefs and local religions, and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Among the hot topics in the last decad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urban, imperial and global history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Shanghai history, and there are some changes in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academic orientation. These topics have much merit for the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The increase of number of dissertations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that the study of Shanghai history is seeing a good